【动态】

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史　讯

继已故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发起主持的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十一年后，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7月10日至13日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南朝鲜、新加坡、美国、英国、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大会论文或提要八十多篇，还有6名学者以口头发言形式报告了论文观点．代表们就明清（包括近代）时期以下几方面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文化、思想．孙文良就入关前及康乾时期满族对汉文化的汲取、满族文化的发展与成就、各阶段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发表了见解，认为入关前满族统治者竭力使汉族文化融于满族社会之中，保持了其文化的浓厚的本民族特色．入关后则是满文化逐渐为汉文化所取代．魏鉴勋认为，清代曾出现两次文化碰撞，清朝之肇兴是满族努力吸收汉文化的结果；而19世纪的清最高决策者对西方文化的东渐采取鄙视、排斥态度，清王朝只能伴随封建文化的衰竭而走上衰亡之路．陈金陵具体阐述了乾嘉时期的士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学习态度．郭厚安、黎邦正分别论述了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周积明就纪昀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与18世纪的精神潮流表述了看法．白新良考察了明清时期直隶书院发展，变革及其废止的历史过程．

史学方面．乔治忠论述了乾隆中期所掀起的重新清理开国史的官方史学活动，并分析了其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以及与编辑《四库全书》等文化学术活动的关系．姜胜利考察了清代私家明史研究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兴衰的原因和背景，分析了其史学理论和方法，探讨了清人对明史的认识和评论．傅贵九介绍了明嘉万年间的知名学者郭子章的学术活动．认为他所著的《郡县释名》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古代中国地名专著．刘泳聪（香港）对清代专门辑录关于妇女记载的类书——　　奁史》的取材、义例、与其他类书体例的异同、史料价值等作了探讨，并就该书所反映的妇女生活面貌、古人记载女性事迹之态度等进行了评论．李宪庆对《清史稿·仁宗本纪》的谬误之处作了校勘．

近代文化、思潮方面．陈振江发言指出，从鸦片战争时期起，以学习西方和探求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潮强烈荡涤着学术思想界，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有关舆地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主要表现在世界舆地学研究的兴盛、传统史学研究的新突破和资产阶级史学体系的初步确立等方面．李喜所考察了晚清洋务思潮兴起的阶段性，论述了这一思潮具备对外抗争的民族性、牵动多种政治势力的广泛性，及其兴起发展的必然性，分析了洋务思潮与太平天国运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关系．

二、社会问题、社会群体与生活．冯尔康对清道光朝社会问题的各种表现、产生的原因、道光帝的态度以及朝廷不能改变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等问题作了论述．并呼吁学界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制度、政府政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严重不相适应的标志，是向人们发出进行社会变革的信号，进行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分析社会历史的演进和总结历史经验．李来福（丹麦）通过明清及同时期的欧洲一些国家对社会基层组织、个人控制程度的对比，认为当时中国的一些控制民众的措施实际上并不能达到目的，不如西方控制强烈．曹贵林以档案资料，对江浙等15个省区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乡风俗例作了论述．朱诚如论述了清人关前辽东的人口问题．王松龄等以文献结合调查资料，对叶赫满族的社会生活习俗

及萨满信仰等进行了阐述．王冬芳经过考察，指出清代男子辫发经历过由入关前的“脑后小手指细一绺结辫下垂、余皆剃去”，到清初的“金钱鼠尾”式，再到嘉庆后至清末的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其变化的原因．来新夏把清前期的城市居民按职业分为小商贩、服务行业、塾师医生等自由职业者、艺人、迷信职业者、僧道、长随仆役乞丐、地棍流氓等九大类，分别论述了各类人员的状况．王兆祥则将明清民间宗教徒的社会构成分为农民及流民、僧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军人与水手、太监与官僚贵族，并逐类作了考察．侯杰阐述了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求实用、多神崇拜及迷信的特征，并论述了这些特征在历次重大事件及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宗族与宗法制方面．闫爱民分析了明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并对这一事件引起的明代宗法观念上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在明代宗族制度史和思想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作了阐述．常建华不同意一些学者关于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的一些看法，就该问题进行了辩析．并对政府关于百姓祠庙祭祖的态度、有关规定及影响作了论述．宋怡明（英国）探讨了福建罗江的乡族活动．杜家骥对清皇族的宗法、祭祖、族长之设置及宗人的教育、婚姻、养赡、管束、家法、皇帝与皇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了皇族宗族制度的特征及宗人管理与国政的关系．

三、中外关系．在中朝关系上，明初洪武年间，明廷曾三次以朝鲜向明朝递交的外交文书中有“讥侮”或“戏侮”词语，扣留使者并要求朝鲜追查责任．朴元熇（南朝鲜）不同意某些学者把这一事件看作是明为压服朝鲜故意制造借口的提法，认为它是明初之文字狱波及到朝鲜的一种表现．冯荣燮（南朝鲜）论述了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及朝鲜的崇明报恩思想．中日关系方面，水野明（日本）对丰臣秀吉的身世及侵朝征明计划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究，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构想，可以溯源到16世纪丰臣秀吉之侵朝征明战争．德川时代，这种扩张思想在日本更产生了普遍的影响．陈福坡（日本）论述了日本自清同治年间起即采取一系列侵略中国、朝鲜的活动、直到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中英关系方面．刘敬生（日本）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国内政治背景及一系列扩张活动作了阐述．吴振强（新加坡）对1850年发生在福州的导致中英外交争执的神光寺事件作了新的评论，认为闽省督抚充分了解到不平等条约在外交上产生的种种束缚，在处理这一事件上试图作出符合客观条件的反应，其作法具有合理性．乔毅成（美国）介绍了英国政府在1857年无视议会权力而批准侵华行动以致遭到议会强烈批评一事，并就议会的失败性结局作了评论．此外，费克光（澳大利亚）探讨了明朝时期中国与葡萄牙第一次交往的情况．查尔斯·A·德斯伊尔（美国）考察了被学者忽略的1875年—1878年间中美外交中的重要事件．刘鉴唐论述了明清时期罗马教皇所遣来华使臣的活动和影响．郭蕴静分析了清初海禁与对外关系，指出海禁是针对国内反清势力，不能称之为外交上的“闭关锁国”．王湘云评介了美国学者对中外关系研究的一些看法．

四、政治．关文发研究了明代翰林制度的发展、完善及政治作用诸问题，指出明代翰林制度确保了翰林官员的素质，使翰林院真正成为储才之所，翰林入仕在官僚机构尤其是内阁中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R·泰勒（美国）通过对明官修“会典”的目的和指导思想的分析，提出了明代制定法律的依据是“天理”等看法，王兴亚对明代廉政措施的得与失作了探讨，指出明初近百年间大力加强廉政立法，严厉贯彻各种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其措施未能触动产生贪污腐败的根基，明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而收效甚微．曹国庆探讨了明代的清军——清理军籍制度的创立、发展及其对军事、政治、社会的影响诸问题．方志远研究了明代宦官衙门——御马监与禁兵——四卫营、勇士营的关系，说明它在巩固明朝统治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外廷官员与内廷宦官围绕这两个禁兵营互相牵制、争斗的事实．松本隆晴（日本）对明中期的宋贲燔之乱作了新的剖析，认为当地高级武官的参加乃是此次事件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同时也表明当时边镇体制的渐趋松弛．魏千志利用近年新发现的明末人写的《记难图》手稿，对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些史实

及明末乡试、士子活动等进行了考述。孟昭信考察了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前建四旗时的旗制，并对四旗的建立时间、旗主、与八旗的演变关系及影响等作了研究。马楚坚（香港）以广东为例，对清初的禁海、迁界令的实施诸问题作了细致考察，并对清鼎革时即实行的禁海发展为以后的迁界之原因发表了见解，何龄修对杨鵾空赦案——清初江南一起反清复明运动的经过及结果等作了探讨。谢刚考察了嘉道时期的王朝体制特征、财政及社会状况，就朝廷、官僚士人为解决社会危机所进行活动的性质及其局限性阐述了看法。李世愉探讨了雍正时创立的朝考，即皇帝对殿试中试的进士进行考试以选拔庶吉士的制度。朱金甫对清代延幕之风盛行的原因及州县幕友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地方官建立私人班底以把持权力是最主要原因；幕友的主流是佐官以治而非助官为恶。

五、边疆民族。王钟翰《试论清代的民族政策》一文指出，与过去历代王朝比较而言，清代对边疆各地区各民族因地因族而异，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成功的，并通过清对东北各族，大漠南北蒙古，新疆蒙、回各部，西藏及甘青地区，西南土司及改土归流地区等采取不同政策、措施的状况，论述了这一观点。蔡美彪探讨了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问题。袁森坡对乾隆进军西北之失误：选用将帅不当、错杀额琳沁多尔济、大满族主义的淫威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等作了论述。

六、财政、社会经济。明代苏松"重赋"及其原因，是一个颇为史学家注意而迄无定论的问题，郑克晟通过对苏松、江西、陕甘等诸重赋地区的综合考察，认为《明史》所说出于政治原因的论点不能轻易否定。何本方对明代钞关制度的产生、发展、征税制、税额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及制度的弊端作了考察。陈锋探讨了清代八旗的战时俸饷制度，指出该饷乃平时俸饷之外的加给，它加重了清廷财政的压力。

关于社会经济。薛虹认为，明清小农经济中的商品生产比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特征表现为小农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具有普遍性并在流通领域中起决定作用。当时的小农经济是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小农经济还出现下滑趋势。黄冕堂对清代农村长工工价的上涨、各省区的不同工价、产生原因等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明清时期，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对商品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许檀认为，明清之时运河商品流通以民生日用品为主，明以纺织品为大宗，清以商品粮为最。明代运河商品流通以北方消费市场对江南经济的依赖为背景；清代则以华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相对独立为背景，且与长江、沿海流通相联系而逐渐形成新的流通格局。区域经济上，郭松义根据各地发展不平衡状况，划分为：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封建经济发展较充裕，地域上多属传统农业的发展地区；大量流民进入的有较大发展的开发中地区；及边远山区的不发达地区。并对各地区特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作了阐述。袁清（美国）从事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与商业化的研究，他首先评述了欧美等地及中国学者关于这类专题的研究成果，并说明自己以局部解剖来研究江南各类城镇的做法。铁山博（日本）以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为例，说明清末实行"移民实边"开发该地农业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吴天颖就清代同治年间四川富荣盐业出现股份"分等"的说法进行了考辨，认为此说不能成立。此外彭云鹤探讨了明代漕运的社会影响。森田明（日本）论述了清末民初上海浚浦局的设立改组的曲折过程，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而对此事的干预及中国各界采取的对策。

七、人物。李洵把明武宗的种种行为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认为他既有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性，而他的种种怪诞行径，则是他和那个阶级的一些人意欲挣脱束缚，追求自在与放纵的苦闷心理的表征。贾乃谦论述了明代后妃们的地位和活动，分析了她们在朝政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方祖猷把万斯同一生分为四个阶段，阐述其文学思想及其史学产生发展的过程，并就关于万斯同学术的某些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谢肇华等对明初女真族杰出首领猛哥帖木儿的活动作了论述。指出他效忠明王朝，维护明中央集权统治，及侨居朝鲜时保持与朝鲜的友好关系等，值得肯定。张玉兴对后金时的汉官李延庚被杀一事作了研究，指出李延庚之"通敌"也即通明，是后金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与压迫，对为

它效命的汉官猜忌、歧视、欺凌，汉官处境恶劣造成的，明朝的不断策反也是重要原因．陈生玺对有关毛文龙的镇江之役、对后金的所谓"牵制"作用，毛与朝鲜的关系及皮岛商业，毛死后之皮岛等问题作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何广中（澳门）论述了郑成功在南澳一带的抗清及复台活动，指出他的爱国精神与抗清斗争的意义．赵秉忠论述了乾隆八次亲诣曲阜祭孔的活动及其原因和影响。沈景鸿（台湾）对名臣张廷玉晚年在朝廷中的处境、与乾隆的关系及其最后归宿作了说明．杨启樵（侨居日本）研究了有关溥仪的互相矛盾的史料，强调清史研究应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订．

另外，山根幸夫（日本）介绍了近十年日本的明史研究状况．

未能到会而向大会提交论文或提要的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蚕文化》、唐文基《论"根主"—— 福建"一田二主"探析》、吴建华《天之骄子 — 清代庶吉士群体考察》、吴智和（台湾）《明代提学的建制及其权责演变》、陈进传（台湾）《清代宜兰汉人的移动》、段柏林（日本）《维新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吴仁安《论明清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及其盛衰存废变迁》、汪茂和与成嘉玲（台湾）《清代皇家财政之研究》、魏白蒂（香港）《清朝中叶的私人幕僚与学士：阮元及他周围的文人墨客》、林满红（台湾）《劣质铜币充斥促成嘉道年间银贵钱贱说之商榷 —— 清王朝中衰内在因素影响程度之再省思》及苏联学者克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霍赫洛夫关于"'大清律例'的编纂及其性质"的论文．

随着明清史研究的迅速进展，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新材料被陆续发掘利用，已往的研究专题进一步深入，这些可喜现象，在此次会议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如社会史，是近年来兴起的引起人们重视的新领域，研究范围不断扩展，会议上，既有对清代某一朝社会问题的全面考察与宏观分析，又有对某些具体问题如社会群体、宗法、祠庙祭祖、风俗等的抉奥探微；社会阶层上至皇族下至平民，从农村乡族到城镇居民，都有研究成果出现．在许多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发现鲜为人知的史料，揭示历史现象，或提出新的见解；有些外国学者利用本国资料，公布其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对老问题以新方法或新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

总之，这次会议的讨论及所提交的论文，体现了求新、求实的精神，学者们加强了学术上的交流与联系，是一次成功的学术讨论会．

(上接第 47 页)

第三编系主要清史专著简介，分清朝前史，清朝通史、政治、军事与兵制、经济、民族与边政、阶级与等级、宗教、中外关系、人物、学术与思想文化、史料学、其它、个人论文集 14 类，介绍了 132 种学术著作．

第四编是清史史料简介．首先分析了清史史料特征，然后分编年体及纪传体史料，政书、档案、方志与边疆史地资料、文集、笔记、人物传记与年谱、宗谱、专题性资料、其它史料几类分别评介．每类史料既总述其特点，又例举主要书目，便利人们掌握．

第五编为论文索引．因已出版的《清史论文索引》搜录了本世纪初至 1981 年 6 月间的论文题目，所以本书只收集 1981 年 6 月以后的论文，既避免了重复，又保证有足够的篇幅收录新的论文题目，索引分目全面、细致，也极便人们检索．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除全面介绍中国大陆的明清史研究之外，还相当多地反映了台湾和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成果，这也是该书的特点之一．

通观全书，作者在书的编排、体例方面独具匠心，搜集研究成果用力甚勤，对已有研究的剖析动中肯綮．可以说，是书在手，清史研究状况便了然于胸，的确具有指南的性质，应是清史爱好者案头常备之书．